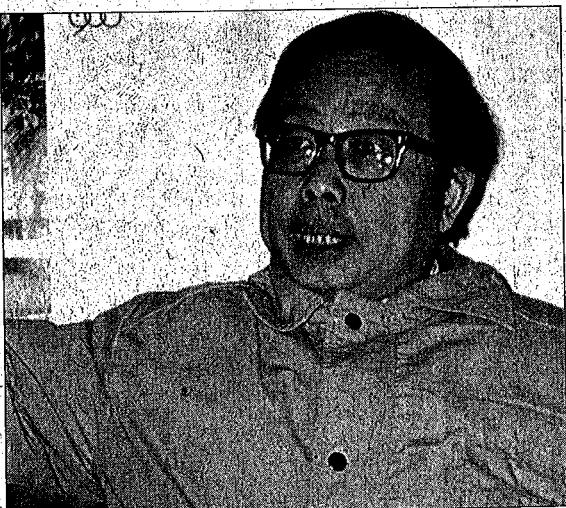


初級階段的幾種知識份子

□白杰明

方勵之的威脅和啓示



▲方勵之：使中共感到棘手。

——談方勵之、劉賓雁、吳祖光

在高層混戰中，中國大陸出現了幾種知識份子。

方勵之這種有民主思想的科學家，開啓了非黨的政治文化。

劉賓雁信奉了半世紀社會主義，仍要相信好人可以改變共產黨。

吳祖光體現了中國文人的品德，灑脫地對黨表示輕蔑。

當年身份卑微的電工魏京生提出關於第五個現代化，即中國的民主化，很快就被人民民主專政的鐵掌鎮壓了，久而久之還被人們淡忘了。（最近國際特赦組織獲悉他已死於獄中的消息，但北京予以否認。）

今年六月，方勵之這位國際聲望頗高的天體物理學家，也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高級知識份子和老黨員，在被清除出黨以後，在意大利接受西德《明鏡》週刊記者鄧天諾的訪問，悍然宣稱：「魏京生十年前開口說了話，今天我步他的後塵。再過十年也許會有更多學者張開嘴說話。」

恰如李克曼當年的評論那樣，海裏的魚一旦開口即語驚四座。方勵之的這個訪問記，香港的《動向》在八月譯載，幾週之間就成了在北戴河開會的政治局成員的參考資料，但在國外卻很少引起反響。其後，在訪問記的英文節選發表後，還有一些中國觀察家和駐北京的外國記者還詰異地問：真有中國人會這樣大膽、明快嗎？

其實，方勵之和他的夫人李淑嫻受過很嚴格的西方科學、邏輯學的教育，因此較全面的領會了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及其對現代文化、科學的昌明和產業革命的重大影響。他們是中國知識階層裏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典型。方勵之的出現本身不足為奇，但他在「反資」運動之後，巧妙地利用他在國際上

科學界主動地稟告牠們在海洋活動的情形，魚類學界無疑要為之震動一番，而魚類學專家也許不得不改變或者否定他們的許多「科學」成見。

中國大陸的知識界和青年的情況，同那些突然學會講話的魚有很多相通之處。這是以「離經叛道」著稱的漢學家李克曼（Simon Leys）用來譏諷海外中國問題觀察家的比喩（見The China Experts一文，一九八一年），因為他們都低估了李一哲、魏京生等人在中國大陸出現的非凡意義。

今年，在「北京之春」之後的第八年，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政策推行了多年後，在又一次情況中國大陸又開腔了，並向外界呼喊，關心和觀察中國大陸的人，不能不聽聽他們呼喊的是些甚麼。

充他對中國民主化等問題的看法，這是中國多年來

敗。為了幫助許多人澄清冤假錯案，他曾多年疲於

簡出，小心行事，主要原因是擔心有人借用他的報

在近幾年來的忽然忘形的大陸》

力羣的算法，自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派」，像劉賓雁。

以來，中國意識形態方面有過六次重大的較量或鬥爭），像四大不要臉那樣的老文藝政客和一些中年投機份子的行為，恰巧表現出現社會主義社會某類這樣的人，卻體現了中國一些舊文人的高尚品德。

失去自我，唯命是從、看風轉舵的人的惡劣品質。他們並非中國特產，他們是極權高壓下的產物；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少不了這麼一批人。但像吳祖光

的舊詩裏面的對聯掛在家中的客廳，以表露坦然的心情，對云：「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素不喜喝酒的吳祖光，還接受中國酒文化叢書的編委的委託，主編一本關於酒的文集，暫定名為《解憂集》。

在該書的徵文啟事中，吳首先引用了曹操的名句：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在八月一日，亦即他退黨的同一天，他寫好了啟示。這些都足以表明吳祖光的真肝膽，他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中國文人。

棍破壞文藝的卑劣作法，並呼籲中共廢除戲劇審查制。他一向忠實於自己，絕不輕易地為某種莫須有的理想背叛自己的信念和人格。

幾年前吳祖光大膽批駁鄧小平親自發動但沒有領導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並聯絡了一批政協文化名流給中央寫信勸停清污。他在大小會議上批評黨人，也對他這般輕蔑共黨的表現相當反感。而實際上，在他們說吳祖光「軟骨頭」的嘀咕聲裏面，倒隱藏着一種虛偽和懦弱的心態。這是因為在與吳祖光的光明磊落相比之下，他們的怯弱和「機智」顯

又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類似今年中國大陸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的鬥爭所帶來的局面，匈牙利作家哈拉茨蒂在他的著作《劃地為牢》中早有描繪：由粗野的槍桿子和僵化的統治邁向較高級「軟性」的技術官僚的更替

時期拖得愈長，所謂新的開明政策的連續性所受的干擾和反覆就會愈多。並且，每出現一次反覆，共產黨本身就製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離心份子」。在今年中共上層的混戰中，中國大陸出現了幾種不同類型的「異己份子」：方勵之這種有民主思想的科學家；王若望這種剛強正直的老作家；吳祖光這種現代化了的中國文人；還有新的黨外「觀望



▲吳祖光：不屈為至貴。

前三種人都利用了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示他們對今年的非理性的清洗運動作出抗議。在中國內外，不少人也用了不同的方式對他們表示支持和鼓勵。這些無疑是一個有深遠意義的現象。他們沒有消聲匿跡，如果說是由於共產黨進步了，不如說是因為國內外的輿論壓力和黨的利益不容許再推行任何急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這個進步理應算給新的黨外人士才對。

趙紫陽在十三大的報告中高談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共為了近年的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的推行，製造一個能夠兼容並包一切的「黑箱子」是必要的。

可是，如果大陸的社會確是遠沒有超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話，對混亂不堪的意識形態應當怎麼辦？在推行半社會主義的經濟路線同時，難道大陸的知識和文化界要被迫搶先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嗎？

一九八五和八六兩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時期，有如五十年代的大鳴大放，只不過兩者的趨向是相反的。三十年前中國大陸在走向共產主義初級階段；而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國的社會主義卻要奔向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去。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給鄧、趙的實用主義經濟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但並沒有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即意識形態）之間與日俱增和不可彌補的鴻溝。故此，中國除了因為經濟改革而引進了西方式的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外，還出現了像「清污」和「反資」這些週期性的政治和文化危機，並且產生了方勵之、王若望、吳祖光和劉賓雁這樣的知識份子。